

《同文尚书》出版感言

王国华

《同文尚书》由山东齐鲁书社出版了，一百多年来，几位前贤的心愿实现了，这是国内外研究古文献专家们的喜讯，使我感慨万端，心情久久不能平息。

1979年我为了出版《同文尚书》，到北京拜见顾颉刚先生，听取高见，这个消息很快地被传开，都来问我何时出版，国外友人也来信向我索求。这部书引起学术界人士这样关心，正说明其价值的重要性。

《同文尚书》的作者牟庭先生，初名廷相，字陌人，号默人，山东栖霞人，生于清乾隆二十四年（1759），卒于道光十二年（1832），终年七十四岁。乾隆六十年（1795）科贡生，任职观城训导，后因病辞官回里。从此闭门读书、著书，不与外界接触，就是同村人，也难见他一面。他一生著述勤奋，垂老不倦。后来他儿子牟房，编了一本《雪泥屋遗书目录》，记他父亲的著作及批校之书，有五十多种，其中最主要的是《同文尚书》和《诗切》。

他对自己的著述，从不满足，要求很严格，再三易稿而不定，决不轻易问世。譬如《诗切》，他写了有三十年，改换了六次草稿，可是他在序言中，仍觉不满，还要继续增补削改。因此他的著作，除早年刻行《楚辞述芳》外，其它皆来刻版，这样，他的学名长期被埋没了，一直到现在人们还是对他那样陌生。但是他这种治学谨严的精神，是值得学习的。

这部三十万言的稿子，作者从清嘉庆二年（1797）开始写，到道光元年（1821）脱稿，初名《尚书小传》，那时他已经六十三岁。后来他还是不断地修改，还抄集了一些资料，准备作序，可惜序没写成，就与世长辞了。这部稿他前后研究修订了四十年，真称得上费尽毕生精力，呕心沥血的结晶。

《同文尚书》是将今、古文两学派合并，共同作了有系统的研究，所以借用

《礼记》“书同文”来命名。作者“把伪古文经全部去掉，但不偏于真古文，也不偏于今文”，大胆认真地将经文确定下来，然后再分别考证，排除不合理的旧说，提出了新的见解，自成一家之学，这是书中立论明确的主要因素。

研究古代史，应该首先研究《尚书》。历来研究《尚书》的书籍很多，涉及到的问题也很广泛，出现了各家不同的注本。这么多的书，如不全读，掌握资料就不全面，如完全读完，是一件相当麻烦的苦事，再加以贯通理解，那就时间太长，极其繁琐，况且也没有令人满意的《尚书》注本。《同文尚书》较简练而全面的总结了前人的著作，作出了合理的论断，将“诘屈聱牙”的经文，译成通顺易懂的通行文言，只要细心去读，就可以逐步地理解经义，掌握那些繁杂的注释，使读者节省了很多时间，这是我们研究《尚书》较方便的参考书。这次的影印本，是先父王献唐在“七七”事变前清抄的，一直未能校订，我又仓促间补上了其中的残缺部份，肯定有不少的错乱讹误之处，希望重版时能重新校勘。

这部书今天才印行，真是来之不易。作者逝世后，他儿子就想刻版未成，后王懿荣也想整理出版，因庚子之乱，“身殉书亡”。一九三四年，先父主山东省图书馆，广求山左遗稿，选编《山左先哲遗书》丛书。他将得到的《同文尚书》和《诗切》，编入丛书内。这两部稿子，曾经各清抄二份，一份自留，其它两份，《同文尚书》请齐鲁大学教授栾调甫先生校订，《诗切》请山东大学图书馆馆长丁伯弢先生校订。那时间一多先生与先父有文字交，他也审读过《诗切》，极其推重。

一九五八年，山东人民出版社欲据《同文尚书》的旧清本影印，因先父要略加校订，后宿疾复发，遗恨逝世，只留下了一篇未修订的序言草稿。一九六五年顾颉刚先生赐函，索此清本校订付印，由于“文革”开始，未能如愿。1979年我到北京访顾老，顾老在医院将清本交给我，关心地说：“你要仔细校订，希望早日出版”。但此本已残缺十万余字，我据顾老的另一副本补齐，这就是今日印的这个本子。可惜顾老看不到这书了，我也没能够遵照他的嘱咐仔细校订。

《诗切》我原有清本，在十年动乱中丢失少半，原作者的手写本在台湾，不能据以订补，幸齐鲁书社编辑，在山东大学图书馆查得一部清抄本，这真是意外的收获。我想这清抄本，就是当年丁伯弢先生所要校的本子。这部书也将

要由齐鲁书社印行。

《同文尚书》，历经风霜，一百多年来，它象久埋在地下的一颗明珠，被齐鲁书社挖掘出来了。我相信这颗明珠，在我国古文献中焕发出光彩，为今后研究《尚书》的人，开辟了途径，带来了新的启示。

《海录碎事》翻检小记

陈汝法

宋人叶廷珪有二十二卷的《海录碎事》。据其自序，可以肯定《海录碎事》只是他《海录》中的一部，即“其细碎如竹头木屑者，为《海录碎事》”。另外还有《海录未见事》、《海录事始》、《海录警句图》、《海录本事诗》等四部。《海录》是部规模很大的类书，就是流传下来的《海录碎事》也堪称巨著。其文献意义，简单地从它列入“四库全书”，并有日本刊本，便能窥见一斑。

《海录》大部分已湮佚，现存《海录碎事》可能也有佚有衍，因为《海录碎事·自序》云：“因取而类之，为门百七十五，为卷二十有二”《宋史·艺文志》又作二十三卷，而现在看到的《海录碎事》是二十二卷，分十六部五百八十四门。当然这种情况在古籍中是屡见不鲜的。

叶廷珪的《海录碎事》似乎很少有人提及它，至六十年代夏承焘先生的《姜白石词编年笺校》问世，在《齐天乐》一词“庾郎先自吟《愁赋》，凄凄更闻私语”句下笺云：“今本《庾子山集》无《愁赋》，前人谓白石此句杜撰。案：王若虚《滹南遗老集（三十四）·文辨》谓‘尝读庾信诗赋，类不足观，而《愁赋》尤狂易可怪’。又刘辰翁《须溪词·兰陵王送春》亦云‘更江令恨别，庾信愁赋’，似宋金人所见庾集实有《愁赋》（顷钱锺书先生见告：《愁赋》见叶廷珪《海录碎事》卷九下。宋代王安石、黄庭坚、韩驹、薛季宣皆尝引此文。）”由此《海录碎事》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。我们非常敬佩钱锺书、夏承焘两位老先生。

《文献》80年第三期《类书的文献价值》一文就提到了庾信《愁赋》和《海录